壹、前言

政治是追求權力分配的過程,在此過程中,任何政治事件、決策或者行動的 背後,都會涉及政治人物的動機 (motive)。但動機的形成極爲複雜,如果光從 認知(cognition)著手,並不能完整的理解政治行為,職是之故,人格(trait) 研究遂成爲分析動機的一項有利工具。因爲政治人物的行事風格反映其人格特 質,而動機驅動著人格的形成,提供行動的準則。換言之,人格是一種動態的 組成,動機乃是人格的一項核心概念,如果未能理解動機,則無法理解個體的 行爲。例如,動機影響著政治人物塑造他們的領導角色,在履行職責時,必須 依循該國的制度與規則、遵守的獎勵與違背的懲罰,這也意味著政治人物的人 格特質需受到角色的約束。以美國總統在國家大政與各種決策中的角色爲例, 總統會利用其政治與管理的資源,掌控政府的運作。由於每個總統都有自己的 人格特質,多數的政策必須配合總統的信念與風格,他們的治理模式都是獨一 無二,其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總統的偏好。此外,總統在當選前後行事風 格大變的可能性甚低,這不僅代表著政治人物的心存定見,也彰示著人格定型 後不容易隨著時空而轉換(Newmann, 2003, pp. 21-25)。

由是觀之,大多數現代國家的政治變革,是由於政治人物(特別是菁英)的 意志使然,特別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,許多威權國家的專制領導者往往 扮演關鍵角色。以臺灣民主轉型的進程爲例,蔣經國與李登輝便可視爲是主要 的肇端,若無肇端的啟動,雖具備其他條件,如國民所得達到某個標準,但民 主化不一定會發生(Huntington, 1991, pp. 107-108)。亦即,除了當時時空背景 的結構因素外,能動者主要決定了政治的走向,而他們的人格與動機則是研究 者感興趣之處,吳乃德(2004)認爲民主之於蔣經國乃是獨裁者不得不然的妥 協;石之瑜(2001)認爲民主之於李登輝既是政治鬥爭的慾望,也是國民黨必 須接受以完成歸屬的成就感。種種關於政治人格的爭論充斥著學界,難以獲取 共識,這說明了政治心理學的應用仍需繼續發展,特別是在轉型國家如何評價 政治人物的歷史功過。

準此,本研究之目的便在剖析新興民主國家總統的人格特質與動機,是否 會影響及如何影響國家治理。在第貳節中,首先介紹人格研究,再論其研究方 法如何與政治學相接,跟著探討人格及其背後動機的含義,三種動機驅使政治 人物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爲,可藉由語言分析理解;在第參節中,針對本研究 標的:2008年政黨二度輪替後的馬英九作爲對象,嘗試側寫其動機與政策的關 係;最後一節則是結論,並歸納三種動機交互影響的作用。

貳、人格、動機與政治

所謂人格,是指一個人典型(typical)行為、思維與感受方式的總合,加 總起來讓人與人彼此不同。申言之,一個人的人格由其相對不變的心理特質 組成,這些特質是他或她獨特的典型,特質之所以相對不變,是因爲在正常 條件下,每個人都會有穩定的心理狀況,即使人與人的生理特徵極其相似, 但典型的人格使得每個人獨一無二,也得以區分。目前心理學界大多將人格 歸納爲五個基本特質(big five model):神經質性(neuroticism)、外向性 (extraversion)、開放性(openness to experience)、隨和性(agreeableness) 與自律性 (conscientiousness),這五個特質能夠全面描述人格,它們受遺傳、 環境與經驗影響,而大多數人都可能同時符合幾個特質(Lahey, 2001, pp. 459-462)。在名稱上,政治心理學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用法,除了人格外,還有個性 (personality)、性格(character)與風格(style)等。嚴格說來,這些所指涉 的概念雖不盡完全相同,如性格是深層內生的結構,個性是潛層外顯的行為, 但大部分研究者之研究標的,都聚焦於人格特質乃是個人信仰體系的內容、價 值觀與態度 (Cottom, Dietz-Uhler, Mastors, & Preston, 2010, pp. 20-21)。需注 意的是,文化是締造人格特質的強大力量:在西方世界,個人主義較注重成就 的優越感;而在儒教世界,較強調合作的親密感。不過,這些都只是簡單的劃 分,文化內部也會有許多變化,塑造獨特的人格,不能以偏概全。

雖然人格研究已經廣泛地運用在社會科學各領域,但在目前科學典範的標準下,人格研究受到相當多的質疑。以政治學來說,其分析目標(如政治人物或決策團體)的主觀願望,若非難以檢驗真偽,便可在制度等條件下忽略,此種整體主義(holism)的影響,在 20 世紀一度成爲主流,讓政治心理學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。學界一般的觀點是,人格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泛指作爲普遍現象的互動關係,政治科學所重視的宏觀意義與政治心理學的微觀意義大相逕庭。原因在於後者的研究對象是個體,無論是從人格、情感(emotion)或認知等面向出發,這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(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)總免不了還原論(reductionism)的質疑。也就是說,個人行動是總體社會現象的基本元素之一,但行動不只是其主觀願望的反射,也受制於外在客觀機會的支配(Elster, 1993, pp. 7-9)。不過,政治心理學家則提出反駁,認爲在遺傳(個體接受的生